



60年歌词书写中国记忆

李惠杰

词的文学性与曲的音乐性共同造就了歌曲动人心魂的力量。经典歌曲之所以能够穿越时空,除了它具有被大众认可的优美旋律,更重要的是它催生了一种新的“视界”,使人们对作品的理解达到新的境界。

当我们走进新中国60年的歌曲世界,一个个可触可感的歌词视界依托着色彩缤纷的意象,带着醇厚的审美韵味纷至沓来,歌词文本完美地实现了与社会历史文化文本之间的密切关联。60年歌词走过了基于文人传统的陶冶自我性情、立足于知识分子传统的干预社会现实以及自觉的职业音乐家传统纯音乐创造的古典、现代、当代的抒情范式。但总的情感基调是浓浓的“中国情”,无论是歌词创造的心理结构,还是歌词语义的生成能力,抑或是文化反哺自觉性都有长足的进步。

1949年,新生的中国雄鸡般傲立世界东方,放声歌唱是彼时社会文化的关键词。给人民写、唱给人民听、人民自己引吭高歌是当时词曲作者以及歌唱演员的天职。感谢、感动、感激成为当时的情感主调,其折射于歌词视界中便构成了以自然风光起兴歌颂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毛主席的赞歌。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歌曲主在抒情,分硬抒情和软抒情两大类。所谓硬抒情即指曲调比较高亢、旋律感强烈,而软抒情则比较舒缓、柔美。歌词的创作多采用比兴手法,借物抒情,遵守着马克思所说的“按照美的规律来建造”的原则。《我的祖国》、《歌唱祖国》、《让我们荡起双桨》是这个时期的代表作品。构成歌词视界的意象主要是黄河、长江、五星红旗、波浪、稻花、花一样的姑娘、心胸宽广的小伙、大路、白塔、绿树红墙、凉爽的风、红领巾、鱼儿、山歌、母亲等优美意象,追求宏大叙事,叙述视点由四面八方聚焦于新中国的核心——北京天安门。高大、阔远、绵延不绝的意象恰到好处地承载了人们的满腔豪情,无论是歌者还是听者,因为一个共同的心理现实——对自己国家的热爱、自豪而产生共鸣,因为共同的信念在歌中相融为一体。从雪域高原到平原河谷,人们发自心底地放声高唱,形成了独特的颂歌文化。

在人人参与、纵情歌唱的氛围中,集体情感得到净化和纯化,歌曲成为社会成员陶冶性情的方式,以至于唱歌成为人们生活不可缺少的元素。这种抒情范式一直延续到六七十年代。在《洪湖水浪打浪》中,词作者借洪湖水、鱼网、满仓鱼、野鸭、菱藕等自然意象歌咏“共产党的恩情比海深,渔民的光景一年比一年强”的情感诉求。重要的是此期的歌词中更多意象为共和国建设初期的成就展示:梯田、果树、麦浪、良田、肥沃的土地、闹丰收、常青藤、公社、社员、集体经济等。

上世纪70年代末,拨乱反正时期的国人,“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

歌之。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著名的词作者施光南把万马齐喑后民众扬眉高歌的喜悦心情化作一曲《祝酒歌》,歌词延续了传统文学创作中托物言志的手法,十月、春雷、美酒、长江水、万里山河、四个现代化、阳光等意象掀开了80年代抒情歌曲复兴的序幕。正如作曲家谷建芬所说:“当时青年人需要大量的歌来抒发情怀,要以最快的速度忘记生活中的烦恼,融入新时代的开始。”当正本清源成为社会文化关键词的时候,祖国之恋、家乡之爱、理想主义、奋发进取、振兴中华、凡人小爱成为当时抒情主调,与宏大叙事并行的是对于个人情感认同的微观叙事。并蒂的花儿与甜蜜的爱情、百灵鸟与可爱的中国、光荣的80年代新一辈、池塘边的榕树与“烦恼”的少年、阿里山的姑娘、澎湖湾与老外婆、遥远的小山村与妈妈的吻等,歌词意象瞬间间色彩纷呈,激活了国人心灵深处最纯真而多元的情感,空虚焦渴的心灵得到慰藉。叙事轨迹由聚焦而放射,甚至“天涯海角”都是绝美所在,心灵解放初露端倪。

作为新时期文化的重要形式,流行音乐曾经彻底地颠覆了传统歌曲的创作和演唱形式。“西北风”、“东北风”走寻根路线,凸显地域特色——旷远、浑厚、素朴、直白,歌词中首次出现了山沟、风沙、窑洞、牛、骡子、低矮的草房、断了油的麻油灯、漫长的夜晚、苦涩的井水、干涸的小河、贫瘠的土地、累弯腰的男人和锁愁眉的女人等非美意象,首次大胆直面贫困,表现在无以战胜的自然之下的静默隐忍,隐喻性地言说着失望和希望。这类歌曲中还有青藏高原系列,不会说话的阿姐,天边传来的阵阵鼓声等意象有效地传达着“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创作理念。

著名歌唱家李谷一用一种独特的方式演唱朦胧缠绵的爱,可谓是引爆中国歌坛的一枚重磅炸弹。“爱”第一次成为歌词创作的对象,并在以后呈蔓延趋势,以至于让世界充满爱成为当时歌词意象选择的方向,对于中国文坛这也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随着下海、下岗、买断等名词的出现,人文关怀失落、国人的灵魂承受着拷问。歌词创作积极地在厄运之间构建精神家园——“再没有自己的沙漠,再没有爱的荒原,死神也望而却步,生命之花处处开放”。歌词意象选择的路径再一步拓宽,歌词的情感基调变得更加复杂,既有对过去的怀念,也有对现实的忧虑,更有对美好未来的期盼。军旅题材歌曲,阳刚中满蓄柔情,满头白发的妈妈和梦中的“她”以及枪的意象就以这样软硬不同的质感撞击人们心灵中最柔软的神经。

歌词意象的多元,正是回应了社会文化的多元,流行音乐文化正积极地参与着80年代流行文化的构建。迷惘、否定、建立等诸多

复杂的情感折射在歌词文本创作中,人们发现,解决矛盾与冲突的唯一出路是接纳与包容,于是歌词最终向真善美的诗性本质回归。

随着邓小平南方讲话春风化雨般吹开中国沉重的门扉,人们似乎一下子从茫然走向清醒,唱着《春天的故事》、《走进新时代》,在曾经歌咏的希望田野上高唱着好日子,主旋律再一次在中华大地上唱响。歌唱祖国、庆祝回归、以人为本、全球一家、构建和谐、全民抗灾、同迎奥运的主题不断地被词作家关注,成为引领社会文化的风向标。歌词创作越来越追求传统的诗意,诗家语大量出现在歌词视界中,构成一道别样的风景。而且歌词文本之间发生着内在的逻辑联系,一些意象成为文化符号绵延在歌词视界中,成为一种新的语义存在,如《中国功夫》、《我爱你中国》、《红旗飘飘》、《东方之珠》、《为祖国干杯》;《说句心里话》、《咱当兵的人》与《为了谁》。“春天”、“大哥”、“小芳”、“同桌的你”、“一封家书”、“爱情鸟”等歌词意象,在所依托的语境中产生新的语义,进而形成新的语义系统。歌词视界的新语义生成的特殊价值在于它所包容着的情感因素——缅怀、叹惋、淡淡的哀伤、感恩,不一而足。歌曲进入其本质轨道——诗意地表述难以言传的情感。歌词更多表述个体的心理事件,不再执着于宏大叙事,亦即由政治符号变成文化符号、情感符号。



长歌吟松图(中国画)

蔡起

悠扬美丽的英雄赞歌

——观影片《沂蒙六姐妹》有感

王源

在表现革命战争题材的影片里,似乎总是炮火纷飞、硝烟弥漫遍布银幕,而新近放映的电影《沂蒙六姐妹》作为向新中国成立60周年献礼的重点影片,则选取了别样的表现角度,塑造了富有鲜活气息的人物形象,营造了悠长的审美韵味,以独特的方式形象生动地表现了那段艰苦而又光荣的岁月生活。

《沂蒙六姐妹》塑造了令人耳目一新的英雄形象,赋予了“英雄”以更加丰富的内涵意蕴。英雄,总会让人想起很多文艺作品中塑造的那些抛头颅洒热血、浩气冲天、慷慨就义的光辉高大的形象,但在我们走过的革命岁月中,英雄不仅仅是我们的革命战士,我们的人民,那些在战士们背后的默默付出的普通人,也是当之无愧的英雄。陈毅元帅曾经说过:“我至死都不能忘记沂蒙山,是沂蒙山的小小养育了人民的子弟兵,是沂蒙山的小推车推出了革命的胜利。”

《沂蒙六姐妹》正是以发生在沂蒙老区的著名的孟良崮战役为背景,让我们了解了这次伟大胜利的背后,以“六姐妹”为代表的老区人民为它乃至整个中国革命胜利所做出的无私奉献和巨大牺牲。影片中,为了支援前线,青英、月芬和她们的婆婆这些普通的沂蒙女性们,要在短短几天里不分昼夜地摊煎饼、收马草、做军鞋,粮食不够了毫不犹豫拿出自家的口粮;做担架队员的她们,冒着敌人的纷飞炮火,用柔弱的肩膀在冰冷的河水中架起“火线桥”,让战士们踩着

自己的身躯奔赴战场……影片深刻展

示了在革命年代里,千千万万普通的沂蒙老区女性们爱党爱军、无私奉献的群体形象,这种闪烁着耀眼光芒的大爱大义是如此的感人肺腑、催人泪下,也让我们更加深刻理解了“英雄”的涵义。

《沂蒙六姐妹》以普通百姓生活的日常性侧面表现和衬托战争,以细腻的抒情笔调表现宏大主题,表现手法别出心裁。整个影片自始至终没有出现过正面战场的那种残酷、血腥场景,而是从侧面切入,关注波澜壮阔的革命战争年代中的普通老百姓,他们中有刚刚成亲暗暗牵挂丈夫,却为了凑军粮毅然回娘家借粮食的新媳妇;有舍不得儿子把他关在地窖里不许他归队,却最终含泪送他上战场的老父亲;有坚强无悔

使其伟大文明延续至今。带着这种立场,我开始深入思考如何处理“长安”这个选题。“长相思,在长安”,楼台亭榭,夜夜笙歌,这就是长安;“西北望长安,可怜无数山”,故

国破碎,刀光剑影,这也是长安!在以长安为圆点的中华大地上,各个政权、族群运用聪明才智,争夺生存空间,上演一幕一幕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悲剧。这种生存竞争,与当今中国现代化道路何其相似!

当用一个新的“现代化”眼光回望长安,长安已经显示出远远超出一个城市、一片地域、一个朝代的思想文化

内涵。盘点周、秦、汉、唐四代的社会形态、文化思潮、艺术审美,可以总结出封建“盛世”必备的三个文化支撑:海纳百川的胸襟、物质的富足与人的解放、精英和草根阶层共有的文化认同。

从这个标尺出发,我开始改变局限于历史文献片的常规叙事,也摒弃津津乐道于草野采风的琐碎纪录,而试图通过诗性的思想之光,照耀出一个社会政治文化结构规制下的文化长安。通过古今中外同一时间坐标的对比,全面审视当时世界文明的制高点;“古代的现代化”视角下的兴衰揭秘,又成为追思长安往事的基本线索和重

要依据。

在理性主义历史观和延绵诗意的历史描绘中,通过诗化、恢弘的历史叙事,长安的画卷缓缓展开,我们也由此深刻触摸到了宏大与卑下、繁华与溃败、战争与和平、宗教与尘俗、功名与失意,那些林林总总既遥远又熟悉的集体记忆。

在对历史细节的挖掘中,在记忆碎片的勾连中,试图彰显一个伟大民族理性和诗性融合的文化自觉,寻找一个文明主体含蕴的金石一般久远的坚硬力量。

一曲新声难道尽,十望长安意悠悠。《望长安》,一幅用双手绘就的雄浑画卷:用诗意深沉的左手,勾勒出一个个消逝王朝的背影;用理性思维的右手,为一个文明的新生,开启一扇希望之门。

有人给当今的某些文学批评,概括为“四个一”,即一拨人、一个调、一阵风、一般化。

所谓“一拨人”,就是只要你打开某些报纸或评论刊物,大体上就是那么“一拨人”的“大块文章”,占领着一半甚至一大半的版面。这拨人中有三分之一是“全天候”评论家,小说、诗歌、散文、影视、小品,一般都评论得“到位”,说得头头是道,他们属于经常登场那一类的。另有三分之一的人时而露面。还有三分之一的人偶尔出场。有的人上午参加一个长篇小说的研讨会,下午又赶赴一位“著名诗人”的万行长诗的讨论,晚上还要去一所学校发表演讲。真像有人调侃的那样:“别烦我,我很忙。”有一位很厚道的青年作家,对一位以前非常敬重的评论家失望地说:“他怎么总讲的是那几句话,今天这个演讲,我已经在不同场合听过三遍了。”一位资深作家把某些一天到晚“泡”在研讨会上的评论家,称为“赶场人”。他在电话里诙谐地对我说:“文学有门也无门,‘赶场人’成了‘指路人’。这些先生每天忙忙碌碌,很少读书,全凭那点‘老本’混日子,可是一个五六十岁的人,除了工作、吃饭、睡觉、陪老婆、哄孩子,以及消闲游乐,到底能有多少‘老本’可吃呢?”

所谓“一阵风”,就是评论界对某一问题不关心则已,关

心起来就刮一阵风,这阵风吹过去便一了百了啦。比如有一个时期,农村成了“被文学遗忘的角落”。后来有人对此提出了批评,并呼吁作家面向农村、农业、农民。于是评论家在报刊上铺天盖地大谈作家要深入农村,关心“三农”,反映农村小康建设与农民的生存状态。这阵风吹过去了,也就万事大吉了。

所谓“一般化”,就是说有相当一些文学评论,千人一腔,千篇一律。有些人在某一个研讨会上使用的那些术语、论点、措词,只需换个书名,换个主人公姓名,可以在任何一次研讨会上重唱。尽管他的发言多是些远离文本、没有个性、没有特指的空话套话,但却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是“万古长青”的抽象结论。有位细心的人,统计了某评论家一年多在若干次研讨会上的发言,其中有几句让人读来似懂非懂的理论术语,竟然大同小异地在五次不同的研讨会上说过,似乎都还“恰到好处”。应该承认,有些评论家确确有本领,他们只要读读作品摘要,或是读读序与跋,或是读个开头和结尾,再在研讨会上先听听别人的发言,就敢滔滔不绝地放言“研讨”,还会让一些

人感到“不同凡响”,主持会议者与作者听了也都感觉很舒服。此文针对当今文学批评存在的某些问题而言,并不等于说文学批评“一无是处”。现实情况不是那样,笔者也没有“一笔抹杀”的意思。文学批评的成绩有目共睹,有一大批学者型的文论家、评论家,勤勤恳恳地在文学园地辛勤耕耘,对我国文学事业的繁荣功不可没。但是成绩不说跑不了,缺点不说不得了。

心起来就刮一阵风,这阵风吹过去便一了百了啦。比如有一个时期,农村成了“被文学遗忘的角落”。后来有人对此提出了批评,并呼吁作家面向农村、农业、农民。于是评论家在报刊上铺天盖地大谈作家要深入农村,关心“三农”,反映农村小康建设与农民的生存状态。这阵风吹过去了,也就万事大吉了。

所谓“一般化”,就是说有相当一些文学评论,千人一腔,千篇一律。有些人在某一个研讨会上使用的那些术语、论点、措词,只需换个书名,换个主人公姓名,可以在任何一次研讨会上重唱。尽管他的发言多是些远离文本、没有个性、没有特指的空话套话,但却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是“万古长青”的抽象结论。有位细心的人,统计了某评论家一年多在若干次研讨会上的发言,其中有几句让人读来似懂非懂的理论术语,竟然大同小异地在五次不同的研讨会上说过,似乎都还“恰到好处”。应该承认,有些评论家确确有本领,他们只要读读作品摘要,或是读读序与跋,或是读个开头和结尾,再在研讨会上先听听别人的发言,就敢滔滔不绝地放言“研讨”,还会让一些

人感到“不同凡响”,主持会议者与作者听了也都感觉很舒服。此文针对当今文学批评存在的某些问题而言,并不等于说文学批评“一无是处”。现实情况不是那样,笔者也没有“一笔抹杀”的意思。文学批评的成绩有目共睹,有一大批学者型的文论家、评论家,勤勤恳恳地在文学园地辛勤耕耘,对我国文学事业的繁荣功不可没。但是成绩不说跑不了,缺点不说不得了。

有人给当今的某些文学批评,概括为“四个一”,即一拨人、一个调、一阵风、一般化。所谓“一拨人”,就是只要你打开某些报纸或评论刊物,大体上就是那么“一拨人”的“大块文章”,占领着一半甚至一大半的版面。这拨人中有三分之一是“全天候”评论家,小说、诗歌、散文、影视、小品,一般都评论得“到位”,说得头头是道,他们属于经常登场那一类的。另有三分之一的人时而露面。还有三分之一的人偶尔出场。有的人上午参加一个长篇小说的研讨会,下午又赶赴一位“著名诗人”的万行长诗的讨论,晚上还要去一所学校发表演讲。真像有人调侃的那样:“别烦我,我很忙。”有一位很厚道的青年作家,对一位以前非常敬重的评论家失望地说:“他怎么总讲的是那几句话,今天这个演讲,我已经在不同场合听过三遍了。”一位资深作家把某些一天到晚“泡”在研讨会上的评论家,称为“赶场人”。他在电话里诙谐地对我说:“文学有门也无门,‘赶场人’成了‘指路人’。这些先生每天忙忙碌碌,很少读书,全凭那点‘老本’混日子,可是一个五六十岁的人,除了工作、吃饭、睡觉、陪老婆、哄孩子,以及消闲游乐,到底能有多少‘老本’可吃呢?”

所谓“一阵风”,就是评论界对某一问题不关心则已,关

心起来就刮一阵风,这阵风吹过去便一了百了啦。比如有一个时期,农村成了“被文学遗忘的角落”。后来有人对此提出了批评,并呼吁作家面向农村、农业、农民。于是评论家在报刊上铺天盖地大谈作家要深入农村,关心“三农”,反映农村小康建设与农民的生存状态。这阵风吹过去了,也就万事大吉了。

所谓“一般化”,就是说有相当一些文学评论,千人一腔,千篇一律。有些人在某一个研讨会上使用的那些术语、论点、措词,只需换个书名,换个主人公姓名,可以在任何一次研讨会上重唱。尽管他的发言多是些远离文本、没有个性、没有特指的空话套话,但却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是“万古长青”的抽象结论。有位细心的人,统计了某评论家一年多在若干次研讨会上的发言,其中有几句让人读来似懂非懂的理论术语,竟然大同小异地在五次不同的研讨会上说过,似乎都还“恰到好处”。应该承认,有些评论家确确有本领,他们只要读读作品摘要,或是读读序与跋,或是读个开头和结尾,再在研讨会上先听听别人的发言,就敢滔滔不绝地放言“研讨”,还会让一些

人感到“不同凡响”,主持会议者与作者听了也都感觉很舒服。此文针对当今文学批评存在的某些问题而言,并不等于说文学批评“一无是处”。现实情况不是那样,笔者也没有“一笔抹杀”的意思。文学批评的成绩有目共睹,有一大批学者型的文论家、评论家,勤勤恳恳地在文学园地辛勤耕耘,对我国文学事业的繁荣功不可没。但是成绩不说跑不了,缺点不说不得了。

有人给当今的某些文学批评,概括为“四个一”,即一拨人、一个调、一阵风、一般化。所谓“一拨人”,就是只要你打开某些报纸或评论刊物,大体上就是那么“一拨人”的“大块文章”,占领着一半甚至一大半的版面。这拨人中有三分之一是“全天候”评论家,小说、诗歌、散文、影视、小品,一般都评论得“到位”,说得头头是道,他们属于经常登场那一类的。另有三分之一的人时而露面。还有三分之一的人偶尔出场。有的人上午参加一个长篇小说的研讨会,下午又赶赴一位“著名诗人”的万行长诗的讨论,晚上还要去一所学校发表演讲。真像有人调侃的那样:“别烦我,我很忙。”有一位很厚道的青年作家,对一位以前非常敬重的评论家失望地说:“他怎么总讲的是那几句话,今天这个演讲,我已经在不同场合听过三遍了。”一位资深作家把某些一天到晚“泡”在研讨会上的评论家,称为“赶场人”。他在电话里诙谐地对我说:“文学有门也无门,‘赶场人’成了‘指路人’。这些先生每天忙忙碌碌,很少读书,全凭那点‘老本’混日子,可是一个五六十岁的人,除了工作、吃饭、睡觉、陪老婆、哄孩子,以及消闲游乐,到底能有多少‘老本’可吃呢?”

所谓“一阵风”,就是评论界对某一问题不关心则已,关

心起来就刮一阵风,这阵风吹过去便一了百了啦。比如有一个时期,农村成了“被文学遗忘的角落”。后来有人对此提出了批评,并呼吁作家面向农村、农业、农民。于是评论家在报刊上铺天盖地大谈作家要深入农村,关心“三农”,反映农村小康建设与农民的生存状态。这阵风吹过去了,也就万事大吉了。

所谓“一般化”,就是说有相当一些文学评论,千人一腔,千篇一律。有些人在某一个研讨会上使用的那些术语、论点、措词,只需换个书名,换个主人公姓名,可以在任何一次研讨会上重唱。尽管他的发言多是些远离文本、没有个性、没有特指的空话套话,但却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是“万古长青”的抽象结论。有位细心的人,统计了某评论家一年多在若干次研讨会上的发言,其中有几句让人读来似懂非懂的理论术语,竟然大同小异地在五次不同的研讨会上说过,似乎都还“恰到好处”。应该承认,有些评论家确确有本领,他们只要读读作品摘要,或是读读序与跋,或是读个开头和结尾,再在研讨会上先听听别人的发言,就敢滔滔不绝地放言“研讨”,还会让一些

人感到“不同凡响”,主持会议者与作者听了也都感觉很舒服。此文针对当今文学批评存在的某些问题而言,并不等于说文学批评“一无是处”。现实情况不是那样,笔者也没有“一笔抹杀”的意思。文学批评的成绩有目共睹,有一大批学者型的文论家、评论家,勤勤恳恳地在文学园地辛勤耕耘,对我国文学事业的繁荣功不可没。但是成绩不说跑不了,缺点不说不得了。



文艺点评

微尘,和谐社会的基本粒子

——故事片《寻找微尘》观后感

梁光弟

和谐社会的基本粒子吗?《寻找微尘》围绕着救助杨念慈母女而展开的那种普及到全社会的“微尘”行动,那种“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生动氛围,艺术地印证了上述中央决定的亲民性和真理性。我想,只要我们在更大范围和更深程度上,进一步发扬光大“微尘”精神,培育出更多的“微尘”式人才,进一步发挥“微尘”作为基本粒子的作用,也让我们我们的文艺创作,孕育出更多塑造“微尘”艺术形象、唱响“微尘”主旋律的精品,就会激发社会活力,克服各种矛盾,促进我们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更好更快地构建和完善起来。

影片中“微尘”精神和行动,把中华民族传统文化融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之中,是一种神来之笔。在我们民族精神和传统文化中,讲求“仁者爱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等等。影片《寻找微尘》不仅以众多微尘齐心协力救助杨氏母女治病升学的扶贫救助、互助友爱、乐善好施的慈善行为,践行了这种传统美德,而且,通过杨母不顾个人困苦,在临上手术台前,坚持把“微尘”寄来的一万元助学金交给电台主持人唐影,请唐影帮她寻找并还钱给“微尘”的诚信美德,通过唐影热情帮助杨氏母女的努力,为人民服务的实际行动,通过白总、罗医生和医院院长等人治病救人、助人为乐的美好情操,赞扬了符合社会主义荣辱观的做人原则。请问,为什么众多“微尘”能够

持续不断地做到默默无闻、无私奉献呢?影片用生动的情节和细节,昭示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开放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培育了“微尘”,造就了“微尘”。这是影片能够吸引人、启发人的根本所在。这一切,都活灵活现地把民族精神传统文化融进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之中,因而,丰富了人物形象的性格特征,增强了影片动人心弦的艺术魅力。

《寻找微尘》在谋篇结构和镜头调度上也颇具特色。影片的关键动作是寻找,而且是普展到全社会,广泛动员群众的散发式动作。编导巧妙地抓住了电台主持人唐影,她的职责和岗位,正好便于把普遍发动、广泛动员的散发式“寻找”,用广播电台统摄于一体,避免了广泛寻找容易在影片结构上形成散漫浮泛的毛病。更值得一提的是影片的结尾。到处都是“微尘”,还需要寻找吗?因而寻找的主题,在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中转化到了对面,把寻找的主题升华了。

本片内容源于真人真事,又是缺乏剧烈戏剧冲突的好人好事题材。众所周知,在创作中这两者是不是好驾驭的。可喜的是,编导发挥了难得的创意,能够在平凡中凸显曲折有致,在普通中力求出奇制胜,因而使“微尘”张扬了大义。

总之,影片启示我们,“微尘”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粒子,众多“微尘”聚集起来,将筑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富裕民主文明的阳光大厦!